

走出迷宫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

主编 韩朝华

马剑 宋建 著



责任编辑 刘小灿

监 印 夏书林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

走出迷宫

马 剑 宋 建 著

*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四颁赏胡同4号)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新华书店业务开发部发行

*

1989年3月北京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4

印数: 00001-50000册 字数: 90千字

ISBN7-80060-312-1/F·39 定价 1.45元

前言

从 70 年代末至今，十年改革，十年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新旧杂错，真假共生，良莠并存。它们扑朔迷离，虚虚实实，有时使人觉得胜利在望，有时又令人感到困惑莫明。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到底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中国经济的前景究竟如何？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人渴望了解的问题。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是描述和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和改革态势的系列著作。它所探讨的都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具紧迫性、根本性和危机性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和硕士，他们是青年，热血沸腾，怀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敢于直陈利弊；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他们学有所专，训练有素，对当代中国经济有独到的研究和认识。他们支持改革，但对现行的各种改革思路和方略不尽赞同；他们研究改革，但与当前学术界的主流学派有明显区别。他们有独特的透视角度，新颖的分析思路。他们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不仅富于现实感，而且带有批判性。

中国人素好浓描成功，淡写失误。看“主流”，列功绩，报喜不报忧，似乎成了部分中国人反映现实的准则。中国人惯于今是而昨非。苛责前代，溢美当今，把眼前的困境和难

题归咎于前辈，则又是某些人评论现实的规矩。中国人擅长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人应付现实的方式。然而，当今的时代是以竞争定地位的时代，当今的世界是靠经济、科技实力论输赢的世界。中国要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世界里争一强国地位，必须在把握现实的方式上消除根深蒂固的阿 Q 精神、官场习气和士大夫心态，树立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变革现实的社会人格。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崇尚对现实的正视、批判和变革。它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粉饰太平，不危言耸听。它从中国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实际社会效应出发，运用现代经济科学的最新成果，考察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分析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战略的得失，探寻扫除障碍的途径。

《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不是研究纯学术问题的艰深专著，而是面向社会各界的通俗读物。它的宗旨是将青年学者对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的最新思考推向社会。它为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但不熟悉现代经济理论的人士服务。这套丛书资料翔实，分析严谨，文字晓畅，既富于科学性和开拓性，又具有大众性和可读性。每一个勤于思考社会问题的读者都将从这套丛书中受到启发。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在各自专题领域中的独立开拓者。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难免存有分歧。我们认为这是好事，分歧可以引起争论，启迪思路，正是这种不一致性才可以为读者透视中国经济提供一个多维的参照系。而一切结论性分析都将属于读者自己日。

韩朝华

1988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坎坷不平的征程	(1)
1-1 戴上“紧箍咒”	(1)
1-2 踏上改革征程	(2)
1-3 石头摸遍了，也没找到路	(6)
第二章 先天不足的“怪胎”	(9)
2-1 顺手的选择	(10)
2-2 妙手回春	(14)
2-3 蹩脚的运转	(16)
2-4 棘手的体制后果	(19)
第三章 双重膨胀的启迪	(23)
3-1 沉重的两拳——投资和消费双重 膨胀	(23)
3-2 对改良型改革的“报复”	(29)
3-3 “适度通货膨胀的”不断升级	(31)
3-4 由双重膨胀得到的启示	(36)
第四章 选择中的摇摆	(39)
4-1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目标模式的 选择	(39)
4-2 思路的论争与改革重心的摇摆	(41)
4-3 改革重心摆动的反思	(48)
第五章 通货膨胀的阴影	(54)
5-1 通货膨胀与抢购风潮	(54)

5-2 通货膨胀的原因	(58)
5-3 “两低一高”: 深化改革的心理障碍 ...	(62)
第六章 投入—产出率下降	(67)
6-1 投入—产出率下降与宏观经济困难	(67)
6-2 投入—产出率下降的原因	(70)
6-3 综合治理——走出投入—产出率下降的 陷阱.....	(86)
第七章 流通领域的混乱	(90)
7-1 “淘金热”——流通领域的混乱状况 ...	(90)
7-2 价格双轨制——流通领域有金可淘 ...	(92)
7-3 淘了金子, 露出了绊脚石	(94)
第八章 群众改革心态的变化	(97)
8-1 理解和支持——中国十年改革有 所为的基础.....	(97)
8-2 通货膨胀和腐败——群众改革热情的 消褪.....	(98)
8-3 “虚”、“实”并重——消除心理 障碍	(102)
第九章 中国经济改革何处去	(106)
9-1 选择的艰难	(106)
9-2 不可避免的选择	(112)
9-3 改革者, 你大胆地往前走	(114)

第一章

坎坷不平的征程

1-1 戴上“紧箍咒”

尽管已相隔 30 多个春秋，我们对 50 年代仍是既怀念，又诅咒。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压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们从事经济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仅凭这一点，我国经济就有了轰轰烈烈前进的足够动力。产值、经济效益等诸项指标都令今天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羡慕不已。翻开政府的报告、文件，打开经济学家们的著述，可以经常发现这种怀旧之笔。

然而，50 年代我们对现代化理解得太简单了，对我们的老大哥苏联了解得太肤浅了。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发展工业，实现现代化，都为了一个目的——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苏联已经是世界强国。因此，“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什么国情，什么经济活力，什么体制效应，听都不想听，想也不愿想。我们搬来了苏联的经济体制，我们沿袭了苏联的发展战略。没料到，苏联的经济模式如同孙悟空漫不经心地戴上的金箍，一旦上头，便难以摘脱。它使中国经济现代化之路变得更加曲折，险阻倍增。

在昨天仿照苏联而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在今天成为中

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障碍。这种经济体制过分强调中央的高度集中统一，生产任务统一下达，物资统购包销，财政统收统支，物价统一规定，劳动力统一安置。国家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控制着企业的一举一动。这种行政性的集权管理办法人为地切断了经济体系内部的丰富联系，严重地压抑了企业的活力。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管得过多。结果，运转不灵，效益低下，国家落后，人民贫穷。

孙悟空戴上金箍后很快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中国在建立起苏联式经济体制后不久，便察觉了这种体制的许多弊病。为了改变经济决策权过份集中的状况，从 50 年代后期起，中国便开始摸索着改革这一体制。然而，放了权又收权，分散了再集中，反反复复，几上几下，折腾了近 30 年，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我们认为已脱离了苏联模式，却不过是在斯大林的阴影下踟躇。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没有统一的思想认识，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没有把握住中国的基本国情。

中国在踏步，而世界却在飞跃。来自新世纪的挑战已不允许我们继续沉湎于“放权—收权”的反复试验了。那是杯中水，而中国需要的却是滔天浪。

1-2 踏上改革征程

俗话说：经历过严冬的人才知道太阳的温暖。经历过十年动乱经济崩溃后的中华民族渴求经济繁荣和民族振兴。穷则思变，顺乎民众的历史性要求，我们坚定地结束了十年内乱，踏上了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轨道——改革经济体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同出征的礼炮，在中国大地

上翻卷起滚滚的改革浪潮。如果说清朝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是对沉寂的中国封建政治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那么当今的中国经济改革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一次再造；如果说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开始了一个灿烂文明的时代，那么当今的中国经济改革会成为我们重新掘起、再振雄风的先声吗？切合实际的回答应该是，也会也不会。这取决我们是如何理解这种改革了。

改革，意味着根本改变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或许是由于中国悠久的统一、专治的文化传统，或许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确具有高度统一的客观需要，也或许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就包含着社会化大生产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管理思想，或许是对苏联的崇拜，中国选择了一种高度集中、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权力来维系的经济管理体制，它使管好、管细、管多的理想变成管死、管不了、管不好的现实。整个国民经济死水一潭，宏观经济效益低下。今天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摆正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重新框定计划，尤其是指令性计划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方式。

改革，意味着培育和发展市场，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笃信物质主宰精神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一种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的理论，一种奉平均主义为理想的观念，竟如此轻而易举地使正迈向商品化的中国经济转上了非商品化的发展方向。

然而，规律总是不能制服的。当你顺从它的时候，它为你服务；当你违背它的时候，它给你惩罚。毛泽东都承认，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但这所学校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当今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是要建立能

随机应变，审时度势，灵活地根据经济状况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应是包含了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完整体系。

改革，意味着解放企业，把它的国家的“温暖怀抱”推向暴风骤雨的市场，使其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活力。我们很忠实于列宁，把整个中国经济建成了一个托拉斯、辛迪加的构想。企业只不过是这个“大工厂”里的一个车间、一个班组，它不得不事事唯命是听，没有任何自作主张的权利。难怪人们给它取了一个不褒也不贬的绰号：算盘珠。它可以由政府任意地拨来拨去，做政府的附庸，企业可以没有压力，遇到困难时可以享受政府的保护，就象婴儿一样，无需为自己的利益操劳，遇到危险时也不懂得自我保护。在权、责、利的统一体中，没有权利，没有责任，由此也没有努力生产的动力。天长日久，习惯成自然，一个勤劳的民族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怠惰之中。1978年，我国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带来的产值为96元，仅相当于1957年的70%；同量资产带来的利润更可怜，只有15.9元，只是1957年的67%。

我们曾为中国自然资源的丰富而自豪，如此低下的产出效率，如此惊人的生产浪费，自然资源丰富又能支撑多久？何况自然资源是一回事，而把它加工成直接供我们使用的经济资源又是另一回事。面对这样的事实，能不慨叹！能不思变！

改革，意味着除旧布新，彻底推翻50年代从苏联搬来的那套经济体制，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模式。如同一部机器是由诸多零部件组成的一样，一个完整的商品经济模式也是由各方面的体制组成的，其中包括财政金融体

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劳动就业体制和工资人事制度、商品流通体制、物资管理制度等等。但建立商品经济体制最为要紧之处应该是重新建立物质利益关系准则，树立起物质利益观念。长期以来，我们总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理所当然的互助合作的同志关系，而不应计较物质利益，不应该有享受上的差别，要共同富裕。这种观念和建立在这种观念基础上的体制是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的，实践证明，共同富裕只是幻想，共同贫穷则是现实。当今的改革首先要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陈旧观念宣战，树立起能者多劳、致富光荣的新观念和与之相应的新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之间无偿的互助合作的同志式伦理关系不应该再占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依赖关系。这是人成为“经济人”的必要条件。如果人们都不是“经济人”，整个经济就不可能有旺盛的活力。财政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似乎与人的物质利益要求都不直接沾边，但如果它们不是建立在承认个人物质利益要求的基础上，它们就不可能成为适合商品经济需要的经济调节机制。最终只会导致旧体制的复归。如果果真如此，企业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即便投资，也可能盲目投资。因为投资失败成功与否，完全与投资决策者的物质利益没有关系；没有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就谈不上由个人组成为企业的整体物质利益。如果说银行也作为一个企业，那银行也不会有积极性。总之，否认个人的物质利益要求是整个经济沉寂的最深层原因，而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要求则反过来会成为搞活经济的强大动力。

1-3 石头摸遍了，也没找到路

如果把改革看作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那么在中国开始改革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这股浪潮中颠簸了数十年；如果把改革比作鲜花，那么当我们还在对其心向往之的时候，在其它先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百花齐放。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发源地苏联是最早向这一体制宣战的国家之一。50年代，赫鲁晓夫曾针对国民经济管理权限过分集中、中央经济管理机关臃肿、忽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官僚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等问题，动了两次大的手术。那次改革减少了指令性计划指标，把中央部门的许多管理权限交给了地方。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给当时的苏联经济生活造成了混乱。赫鲁晓夫本人因此下台。改革流产。

勃列日涅夫收拾了赫鲁晓夫留下的烂摊子，于1966年正式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我们现在看来，其实也不新鲜，无非就是扩大企业经济管理自主权；借助经济杠杆，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国家、企业和个人共享利益等等。这和我们近年来的改革非常相似。而且在具体解决这些问题时，也遇到了诸如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障碍。80年代以来，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几年中，改革的浪潮空前高涨。然而，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上是谨慎的，他说得不少，做得却有限。

南斯拉夫的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富有独立精神的铁托并不留恋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为了摆脱贫穷，他在1950年毅然决然地领着南斯拉夫经济向与苏联模式相反的方向走去。与其它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初始改革不

同，作为最早进行体制改革的南斯拉夫坚信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工人自治”的命题，而且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作为它们进行经济改革的依据。空想要变成现实，南斯拉夫的改革切除了国家所有制这个恶瘤。商品生产的原则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得到肯定；联合劳动原则贯穿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尽管南斯拉夫的改革也使其进入了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的迷宫，但它毕竟离目标体制更近了。如果改革的确不是一个证伪的命题，那么南斯拉夫今天的状况可以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

——扭扭捏捏、患得患失的匈牙利很难走出旧体制的迷宫。自从1957年匈牙利拉开改革的序幕之后，时至今日他们也没有采取过一次象南斯拉夫那样的富有深远意义的行动。无论是1957年以后的“小打小闹”，还是1968年以后的全面改革，匈牙利都没有放弃过全民所有制大前提。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他们既偏袒计划，又思念市场。尽管人们也说匈牙利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体制，但我们认为匈牙利不仅没有捞到计划和市场的好处，反而净得了各自的不足。今天匈牙利所面临着比南斯拉夫更深的矛盾和困境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吗？

——动荡的波兰经历了数次起伏不平的改革浪潮。不过，从1957年开始，很难说哪一次浪潮更高。只是在80年代以后波兰才开始从简单的放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这类行动中进一步深化到对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的认识。但波兰的改革偏向于匈牙利的体制模式。实践证明，实行这样的似乎能两全其美的体制的国家，无一不走进死胡同。波兰今天改革的步履维艰正是这种困境的证明。

——在经济体制模式上都曾紧步苏联后尘的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先后陷入了资源产出率低、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的泥潭。他们在寻求走出迷宫的道路上，有的更相信苏联的改革经验，有的则靠近了匈牙利的体制模式。

总之，以 50 年代为开端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冲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已经一分为三：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实行企业自治的南斯拉夫模式；有限度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了市场机制，但仍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苏联模式；介乎于二者之间的匈牙利模式。

中国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也作出了彻底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选择。虽然为时过晚，但毕竟跟上了世界潮流。前车覆，后车鉴。先行改革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知道哪里是死路。后起的中国有可能成为使社会主义改革走出迷宫的引路人。

然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研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更缺乏整体的改革设计，一心想靠“走着瞧”的摸索去闯改革迷宫。十年来，我们摸遍了遇到的每一块石头。可是，路在何方？

第二章

先天不足的“怪胎”

我们在走出迷宫的摸索中首先“摸”准了农村改革^①，令人庆幸的是这一步碰对了。农村改革出乎意料地成功，增强了我们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甚至在广大民众中，改革的呼声也喧沸起来了。因为农村改革的成功，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一时缩小，使那些在十年动乱中工资长期未得到提高的职工都“眼红”了。他们羡慕甚至要嫉妒专业户、万元户，他们盼望改革潮流的到来。在他们的心中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欲念被唤醒了：改革就必须增进福利。甚至在改革的10年进程中，这种幼稚的信念也一直不曾移易过。只要改革能增加自己的福利，他就是改革的热情支持者；反之，他就是改革的观望者甚至反对者。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当时大多数职工都期待着自己所在的企业成为改革的试点单位。收入的增加是激发人们改革情绪的灵丹妙药，再没有什么能象物质利益的刺激那样更能调动人

① 我们以为，当时首先进行农村改革，也并不是统筹规划的行动，对此既没有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也缺乏理论上的探讨，没有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必然性的认识。因而，当时首先进行农村改革并不是很自觉的选择行动。

们的改革热情。但是，在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都还不明晰的情况下，政府的任何临时思路和一时冲动性行为都能尽如人意吗？

2-1 顺手的选择

不知是历史惯性的影响，还是集中体制弊病的简单昭示，从 1979 年揭幕的这次经济体制改革，自然而然地滑入了一条以简政放权、扩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良型改革轨道。

分权让利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它与我们以往尝试过的分权并无实质区别。

(1) 行政分权前的中央集权主要表现为中央各主管部门管辖企业，包括企业的计划、供应、原料来源、资金运用等各经营方面；同时，财政部又做各主管部门的财力后盾，在财政预算管理上实行财政部的统收统支。总的说来，行政性分权就是把中央各部门管理企业的权力下沉到企业所在的各省、市政府。由这些地方政府给企业下达生产计划，组织原料供应等等。通俗讲，就是由“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行政管理。

(2) 与下放管理权限相配套，对中央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实行了某些改革。实事求是地说，这方面的改革对后来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展开起到了铺垫作用，即使现在回顾起来，这方面改革的初始意义和惯性作用都是不应否认的。当时进行这项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根据不同省、市、各自治区的具体情况，酌情实行具体不同的管理办法。

除京、津、沪三大直辖市仍旧统收统支外，对云南、贵州和青海 3 个边缘落后省份以及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和广西 5 个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照顾政策。中央按每年 10% 的递增比例给予财政补贴；福建省实行“定额补贴”，财政补贴数额不再增加；广东省实行“定额上交”，地方财政多收的全部留归地方财政支配；江苏省则实行“比例包干”。其它各省统一实行“划分收支，比例包干”的办法，明确界定哪些收入项目归中央财政，哪些归地方财政，哪些支出项目由中央财政负责，哪些由地方财政负责，还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确定地方收入中的上交比例或中央补助定额，一定 5 年不变。财政管理体制的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集权管理的财力基础。同时，由于地方有了一定的财力，地方政府可以统筹规划和安排本地经济发展以及其它各项事业，从而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强地方的主动性。

(3) 行政性分权表现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使企业伴随着自主权的扩大，获得了一些有实在意义的满足，得到了一些看得见的经济实惠。在分权之前，企业盈利向上交，亏损向上要（补贴），花钱打报告。分权以后，对盈利企业实行了利润留成制度，把实现利润的一定比例留归企业支配，主要用于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等方面。1978 年企业由原来的两手空空忽然变成有 3.7% 的自主支配留利。对亏损企业区分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分别实行定额补贴，限期扭亏为盈和定额补贴、减亏与企业利益挂钩的办法。这些办法都增强了企业增加实绩、力求上进的积极性。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除此之外，企业还在产品生产、购销、人事安排、资金运用和职工奖励等方面都高高兴兴地从主管部门那里得到了一部分自主